

励志中学的开办前后

解放前设在长安的私立励志中学，在整个开办过程中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

1947年春，曾任海宁县长的顾达一（当时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，又是省参议员），在杭州与几个关系较好的人商定，计划在长安创办一所私立中学。首先确定董事会人选，由顾自任董事长。因顾当时规定：开办私立学校，必须有董事会，由董事会负责解决经费来源，才可以向当地政府办理登记手续。在这些手续全部办好以后，就在长安镇东街，正式创办了“私立励志中学”。

校舍问题，顾达一早在上海与本县工商业人士陈阿庆谈妥，将陈在长安东街的私人房屋作为校舍，陈认为自己家属已久居上海，既然是办学校，就很爽直地答应下来，连房租也不收。

在开始建校时，有个董事周永年，诸暨人，是农业专家。当时，顾达一曾想把这所中学办成农业中学，因此把周也拉进在内，并请他负责农业指导。同时还与周商定，设法在学校附近搞一块土地，作为实验区。

为什么顾达一原先想把学校办成农中呢？其原意是，学校培养出学生，以后分派到海宁全县，既可作为农业上的技术指导力量，作为国民党的基层骨干（当然，这些只是顾自己的计划，学生及家长们是不知道的）。

顾达一本人虽住在杭州，但仍经常到长安丝厂及私立励志中学里来。

以后，随着人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，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节节败退，顾达一渐渐对这所学校不感兴趣，最后干脆想“脱掉湿布衫”了。经过辗转设法，终于找到了上海的周渭滨。

周渭滨是海宁人，在上海经商致富。1946年春，他返里扫墓，我偶然在故乡胡斗会面，以后两人经常通信。我在给他的信里谈到：“我乡现有小学，比战前质量更差，老师滥竽充数，设备也很简陋，希望你出资办一私立小学，为家乡做一点事情”，他回信答复完全同意，并说：“现有小学很差，我也知道，不过，我是商人，办私立小学的事我不懂，要你协助”。随后，我办好了登记手续，由周任董事长，我及其他三人为董事。校名由周自定，称为“私立麟振小学”。由于聘来的教师水平高，不收学费，连学生们所有的课本、簿册、纸、文具都由学校负责供给。因此，连胡斗周围三四里外的老盐仓、家桥等地的儿童，也有来读书的。周和我也常到学校里去看看。这时，顾达一、程森士也把接办励志中学的事寄希望于周渭滨。程森士对我说：“顾先生认为，励志停办影响不好，最好改出没有政治色彩的人来接办。你到上海去，先和周渭滨洽谈，可否由他接办。原在麟振小学，可以改为县立。不过中学的经费，自然比小学要大”。我当即赴沪向周试探，和他洽谈。周慨然应允。

接着，顾达一、程森士和我三人一同赴沪与周会晤，正式商谈移

交接事宜。

1948年夏，由周渭滨任董事长，周永年、程森士、谢载青（前一人是周安排的他的亲戚，商人，姓名已忘）等五人组成的新董事会正式成立，接办了私立励志中学，并召开有全校师生及来宾参加大会。周渭滨上台作了简短讲话。校长一职，经董事会决定，由戴谷担任，戴曾担任过国民党嘉善县党部书记长，和桐乡、海宁的教育局长，当时任中央的国大代表，正去南京开会回来。程森士和戴谷是夫妻关系，所以程森士也常到学校里来。

学校接办以后，全部经费由周渭滨一人负担，全年为大米三百石多一点（每石大米按150市斤计算。那时物价狂涨，货币贬值很快，只好改用大米计费）。

临近解放时，戴谷^音携带儿女离校，避居上海。我也避居在周渭滨的“厚丰纸版公司”。我曾亲见励志中学派来教职员两人，向周领经费。周当时拿出黄金一块给他们，并对这两人说：“钞票呢，要快，不能放一放，黄金呢，比较不同，你们拿回去自己调度。总不要使你们吃亏”。

解放以后，周永年曾要周渭滨准备一份书面资料，说明为什么要办这所学校，如果人民政府派人来了解，也可拿出就是。周当时回答：“好”。但以后究竟有没有写这份材料，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，我不知道了。

总之，那次所谓移交接办把经费转嫁到周渭滨身上，实际大权却

仍旧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。他们在解放前夕，使励志中学披上“没有政治色彩”的外衣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谋划。

(谢 载 青 供 稿)